

爱与和平

——丰子恺的抗战漫画艺术

□ 商 萼



1937年11月，中国现代漫画艺术的开创者丰子恺“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携家眷10余人由浙江崇德（今桐乡）石门湾辞别缘缘堂，踏上逃难之路，走过10余省，行程近两万里，历经艰辛，饱尝战乱之苦。这位擅长以诗意的笔墨表现人间情味的艺术家，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一改往日温情的笔调，以笔为枪，积极投身到抗战宣传工作中。

在汉口，丰子恺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会刊《抗战文艺》设计封面题写刊名，并发表抗战题材漫画作品多幅；在桂林，他与弟子合编《抗战歌曲》两册，为抗战鼓与呼；在遵义，他亲自走上街头，指导青年绘制巨幅抗战宣传画，编绘抗战题材漫画集《战时相》；在重庆，他积极参加“抗敌画展”，举办个人画展……

丰子恺坚信抗战必胜，其漫画作品灌注必胜的信念，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他曾说：“古语云：‘众志成城’，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他的漫画作品尺幅小，题材微，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比如《生机》和《战场之春》，主角均为一株小草，纤细柔弱，一棵从灰暗的断壁中探出头

来，一棵在冰冷的铁丝网边昂首向天，寥寥数笔，生机立现。《战场之春》中题诗曰：“谁言争战地，春色渺难寻。小草生沙袋，慈祥天地心。”残酷的战场上，小草顽强生长，印证着天地的慈祥之心，好生之德。

1938年春，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到一棵大树，被人斩伐过半，只余一干，而新生的枝条在春风中昂扬向上，生机勃勃。他深情撰文《中国就像棵大树》：“中国就好比这一棵树，虽被斩伐了许多枝条，但是新生出来的比原有的更多，将来成为比原来更大的大树。中国将来也能成为比原来更强的强国。”他最小的儿子丰新枚出生于逃难途中，取名灵感即来源于此。他以大树为题材创作多幅漫画作品，其中一件题诗曰：“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画中大树的老干虽然残损，但是粗壮昂扬，怒放的新枝蓬勃向上。画家用笔简洁爽朗，充满力量。他还将抗战题材漫画集命名为《大树画册》，寓意抗战必胜。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春天的小草、重生的大树，均是不灭的生机和永恒的希望。

坚定的必胜信念与积极的乐观思想，使得丰子恺抗战题材漫画作品具有令人莞尔的谐趣。《警报作媒人》画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在山洞中躲避空

袭，因此而成就一世良缘。茵茵绿草地，一对佳偶不像在躲避警报，而像是春游踏青。画面所营造的恬静安宁，是对敌人的藐视，对战争的控诉，对和平的向往。

丰子恺坚信艺术可以救国，源于他对艺术本质的深刻认识。他认为：“艺术不是技巧的事业，而是心灵的事业；不是世间事业的一部分，而是超然于世间之表的一种最高等的人类活动。”因此，他撰写《艺术必能建国》一文：“大家有艺术，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抗战期间，他以漫画作匕首投枪，刺向敌人，振拔民心。他以悲愤之笔，画下《轰炸》系列作品：喂奶的母亲头颅被炸飞，怀中的婴儿依旧在吃奶；躲避空袭的母亲在飞奔，背上的孩子已无头……画家以直白的画法直面惨烈之状，摒弃自己一贯的隽永之风。在日寇的恶行面前，丰子恺必须改变风格，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难，就好比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战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和平时时期，丰子恺以诗意的笔调表达对众生的大爱、对人间的深情；战争时期，丰子恺以犀利的笔法表达对敌人的仇恨、对和平的呼唤。以笔为枪，并不违背他一贯的护生之旨。他说：“我们为什么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



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对于抗战艺术，他亦有独到见解：仁爱的内容与浅显的形式相结合，可以发挥最佳效果。《天使》中，小天使双手拦截空中的炸弹，护佑着地上的祖孙三人，画中题诗：“愿作安琪儿，空中收炸弹。”大胆的印象，超现实的手法，令人感动！《万世乐太平》中，废弃的炮弹壳成为花瓶，战争武器变成了花的容器，花瓶谐音平安，荷花象征祥和，“万世乐太平”寄寓着画家美好的祝福。

抗战期间，丰子恺以他极富感染力的漫画作品揭露日寇的暴行，控诉战争的罪恶，鼓舞军民的士气，表达必胜的信念。爱与和平，是他艺术的主题，也是他毕生的追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重温丰子恺的抗战题材漫画作品，感受先生的爱国热忱与文人风骨，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当代艺术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走进拉贝故居

□ 武 星



约翰·拉贝是一个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名字，习近平总书记曾讲道，“中国人民纪念拉贝，是因为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在即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南京的拉贝故居，感受这位国际友人的无私大爱。拉贝故居位于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从1934年至1938年，拉贝在此居住了约4年时间。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在随后的六周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拉贝故居当年作为南京安全区25个难民收容所之一，为600多位难民撑起一片“希望的天空”。拉贝先生目睹了日军暴行，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故居的主体建筑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层（含阁楼）西式小楼。小楼南边偏东位置，安置着一座半身青铜像，底座上刻着“约翰·拉贝1882—1950”字样。拉贝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打着领结，微皱着眉头，似乎在沉思。环顾故居围墙，有一组14位国际安全区成员及其他国际救援人员的简介图片，包括拉贝、贝德士、费奇、福斯特、马吉、米尔士、史迈斯、里格斯、史波林（施佩林）、华群（魏特琳）、威尔逊、麦考伦、辛德贝格和卡尔·京特。走进故居主体建筑，分为一、二楼两个展厅：一楼主要有“拉贝生平”“拉贝日记”“拉贝故居”“永远的回声”4个主题展陈；二楼以“中德友好交流”为主题展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发展与合作。

从1908年到1938年，拉贝先后在中国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生活工作了30年，中国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正如他所说的“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子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得到了成功”。1931年，拉贝转至南京工作，1934年开始在小粉桥1号定居，这里也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

今天的拉贝故居，同时是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国际安全区是故居布展的一条重要线索。1937年11月，仿照上海先例，拉贝与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并被推选为主席。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委员会在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范围内，设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为约25万无辜的中国平民提供了避风港，成为南京唯一一块得以幸免的绿岛。

拉贝故居在当时也是一个难民收容所，被称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这里收容了600多名无处避难的中国平民。如今故居的院子里，还可以看见模拟当时拉贝设计的防空洞。当年，拉贝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日军斗智斗勇。在日军进院检查收容难民中是否有军人时，拉贝竭力护卫，保护了南京卫戍司令部的龙应钦、周清锋等高级军官。由于拉贝的得力保护，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成为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伤亡的收容所。1938年新年，西门子难民收容所的难民在院子里排队向拉贝三鞠躬，并献给他一块大红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后人还称他为“中国的辛德贝格”。

很多人认识拉贝源于《拉贝日记》，这份珍贵的日记正是诞生在小粉桥1号这所故居。今天，在走进故居的参观者中，不乏手捧一本《拉贝日记》的读者。《拉贝日记》也是故居展陈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主要包括《拉贝日记》的发现、出版和反响等内容。这本日记的发现历经波折。由于纳粹的残酷迫害，拉贝在生前未

能将其日记公之于世，这本详实记录了侵华日军反人类罪行的日记一直默默尘封，鲜为人知。1995年，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计划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在调研过程中偶然发现《拉贝日记》，她辗转联系上了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1996年12月12日，莱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向世界公布了这份日记，被公认为是记录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详实的史料之一。1996年12月24日至28日，《人民日报》曾对拉贝日记有关史料进行了长篇连续报道。

自1937年9月起，拉贝笔耕不辍，每天以日记的形式，详实地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前后的所见所闻，一直持续到1938年2月，日记共计2100多页，记录了大量屠杀的500多个惨案。《拉贝日记》不仅仅是日记，更是纪实；不仅仅记录黑暗，也记录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故居展板上有日记的部分摘抄内容，比如他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从后面被打死的。”

1997年，《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随后，拉贝日记还出版了德文版、日文版和英文版等版本，在全世界引起极大轰动。2009年，由德国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执导的电影《拉贝日记》上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一段历史。2016年，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将

《拉贝日记》的手稿慷慨捐献给中国国家档案馆。如今，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在拉贝故居展板中，有两则关于“感恩”的故事令很多参观者感慨。一则故事是关于募捐。二战结束时，拉贝已经是63岁的老人，并已经失业。1948年，当南京人民得知拉贝生活窘困时，南京市议会成立了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很快将募集的2000美元汇给拉贝。从1948年6月到1949年4月，南京人民每个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

另一则故事是关于墓碑。1950年，拉贝因中风在柏林去世，他的亲人将他安葬在柏林西郊的教堂墓园，后因租借期逾期，墓园管理方要求收回墓地。南京市政府得知消息后，不仅出资续租了墓地，而且为他重新修葺了纪念墓园。如今，拉贝墓地上有来自南京的雨花石，墓碑前方的纪念碑上用中德两国文字刻着“感恩——永远铭记拉贝先生的国际人道主义善举！中国南京”。“你待我以诚，岂敢相负”，一位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写下这句话。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拉贝的无畏义举。

故居作为有记忆的建筑，见证着历史，也启迪着未来。2006年，中德双方以拉贝故居为基础，共同建立了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暨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过去，拉贝故居是南京大屠杀至暗时刻的历史见证者，是撑起一片希望天空的“诺亚方舟”；如今，拉贝故居是沟通中德人民友谊的桥梁，是联结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一条精神纽带。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故居展厅结束语中引用了这句拉贝的名言。今天我们走进拉贝故居，重温这一段历史，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仲夏季节，怀化多雨。在参加“福地怀化”采风活动时，怀化文联的同志希望我能利用周日时间与怀化的文学爱好者见个面，见面地点选在工人文化宫一家新开的乐之书店，同行者还有两位著名的文学期刊主编。怀化的雨毫无章法可言，我们出发前，天忽然就下起了雨，而且下得十分执拗，我想，这样的雨天见面的人不会太多，见面会充其量就是例行公事罢了。

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乘车来到乐之书店，书店里坐满了冒雨赶来的读者，门口许多收拢的雨伞还在滴着水珠。读者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还有几名小学生。文联的同志告诉我，这些文学爱好者有教师、机关干部、工人、自由职业者，还有一位老领导是退休后才爱上文学的。

尽管这些文学爱好者身份不同，但听讲都十分认真，讲座过程十分安静，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打手机，比很多专业文学会议的秩序和氛围都要好。讲与听从来都是双向互动，听者认真，讲者就情绪高涨，受听众的专注感染，两位文学期刊主编讲得滔滔不绝，颇具诲人不倦的精神，以至于超出了预定时间。讲座结束后那位退休领导问了我几个创作上的问题，在解答之后我问他：退下来有很多事可做，比如养花、钓鱼、旅游，您怎么偏偏选择了文学？他说：退下来由忙入闲，就好像置身于暑热难消的夏夜，感觉一切都没了色彩，文学好比一盏灯，能让夏夜里的花花草草恢复颜色。

不久前我到有着“苦瘠甲天下”之称的宁夏西海固调研，在彭阳县黄土漫天的文岔乡关口村，我和调研组的同志见到了年过五十的农民诗人曹兵。曹兵一个人陪着年近的父母居住在两栋简陋的房子里，房前是一个场院和两孔旧窑洞，周围没有邻居，就这样一户孤零零的人家对着黄土崖下三十几亩薄田——那是曹兵生计的来源。曹兵没有成家，他的母亲看到调研组年轻的女性就上前拉着手说不停，老人家的方言很难听懂，但我们都能读懂她那种羡慕渴望的神情，她一定希望儿子能早点娶上媳妇，成个家。一般而言，这样孤寂艰苦的生活环境，会在人的心里投下阴影，然而，当我们坐下来与这位脸色黧黑的农民诗人交流时，我们发现，曹兵没有丝毫对命运不公的抱怨，他的心态平和如黄土崖下的麦地。他认为这是诗让他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在网上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诗友，春种秋收、年复一年，他的日子是被文学照亮的。我们去的那天，恰逢母亲节，曹兵为我们朗读了他写的诗《母亲节》，“今天是母亲节，我把最好的诗歌献给母亲……”这个朴实的农民诗人，用诗来表达对母亲最真挚的爱。从他朗诵的诗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因文学滋润而变得生命张力十足的人。

那位退休干部关于文学是一盏灯的比喻并不新鲜，博尔赫斯就有过类似的说法，问题是这句话从一位离开工作岗位的口中说出来，其意义便递进了几层。文学这盏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照亮的领域是不同的，青少年阶段，它照亮的更是追求和梦想；成熟的中年阶段，它照亮的是现实中无法释怀的沟壑；而到了退休后的晚年，它照亮的则是精神世界的反刍和自洽。而农民诗人曹兵靠文学之光取暖的生活令人感动，他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精神的慰藉才是最贴心的慰藉。

生活离不开光，但光与光也有所不同，有的光能晒爆你的皮肤，如沙漠正午的毒日；有的光能灼伤你的眼睛，如电焊闪烁出的弧光；还有的光虚冷飘忽，令人恐怖，如诗人李贺笔下的冷翠烛；更有一些光文过饰非，真假难辨，如镭射光勾勒出的花花世界。文学之光则不同，它包容、悲悯，它柔和、温暖、持久、超越生命、超越物种、超越时空，只要你需要，它就会无私地奉献于你，没有索取，不求回报。

文学之光之所以值得赞美，是因为它具有日月和大地的品格，像日无私照、地无私载一样，它会把光芒赋予每一个有需求的人，无论贫富还是贵贱，所有人在名著面前都是读者，所有作者在文学的世界里都是平等的。生于名家，出于名校，不一定就能写出好作品，而处于底层，出身草根，只要不缺少爱和天赋，文学之光同样会聚焦在你的身上。

文学照亮生活，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照亮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不能否认，一些家境贫寒的人通过文学改变了命运、改善了生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于绝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来说，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文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是幽暗屋子里的一盏灯，或者是密林中透过的一缕光。他们不会去思考更多的所谓意义，只想让这道文学之光照亮日常生活。其实，无需给文学之光附加什么，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想成为托尔斯泰或者马尔克斯，文学之光能做到给缺少感情者以感情，给懦弱者以坚强，给善良者以欢乐，这就足够了。

用文学照亮生活

□ 滕贞甫

神寄托，文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是幽暗屋子里的一盏灯，或者是密林中透过的一缕光。他们不会去思考更多的所谓意义，只想让这道文学之光照亮日常生活。其实，无需给文学之光附加什么，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想成为托尔斯泰或者马尔克斯，文学之光能做到给缺少感情者以感情，给懦弱者以坚强，给善良者以欢乐，这就足够了。

20世纪80年代我在东北一个小市的文化局工作，老局长是一个对草木花鸟、小猫小狗都感兴趣的人，待人处事特别豁达。一天，我在《黑龙江日报》副刊上看到一首诗，诗不长，却感情细腻，意象清新，读来如饮甘泉，我觉得这诗应该出自女诗人之手，但作者却署着老局长的名字。我拿着报纸去问，老局长说这是他在早晨散步时有感而写作的诗，投出去没想到这么快就见报了。当时国内正流行诗歌热，读诗谈诗是文人茶余饭后少不了的话题。有一次我问：您都当局长了，怎么还写诗呢？他说写诗和当不当局长没关系，他不仅写诗，还写小说和散文。老局长给我讲了他与文学结缘的故事。他20世纪60年代末在县里一个文化单位工作，后来因政策调整全家下放到农村。那时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生产方式也相当落后，繁重的农活对一个文人来说绝对是一大考验。生活境遇的变故让他一度感到失落、迷茫，偶然的一天，他读到了鲁迅的散文诗《希望》，他的心房受到了撞击，于是决定用文学来对抗苦闷彷徨，他恶补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文学作品，并尝试着文学创作。他说，如果没有文学，那些日子真的很难熬过来。后来，他创作的拉场戏、二人转被县剧团采用，他也被调到了县剧团，生活轨迹再次发生逆转。

我问他，当初爱上文学是想通过文学来改变生活境遇吗？老局长摇了摇头说，功利的动机会降低爱的纯度，他当初爱上文学，就是为了让乏味单调的日子充盈起来，因为他不喜欢摸牌九、喝烧酒，而打牌喝酒是当地社员流行的娱乐方式。因为文学，他开始留心农村生活的细节，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仅歇后语就记了上百条，是农民式的幽默让他看淡了生活中的坎坷。老局长说，你没发现吗？专家们写几千字论述不明白的道理，农民一句歇后语就说通了。

我明白了，是文学之光的照耀，让逆境中的老局长获得了精神上的温暖，从而让那段苦涩的日子变成了一种体验而不是一种煎熬。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原主席）

